

# 五彩筆下的 台灣真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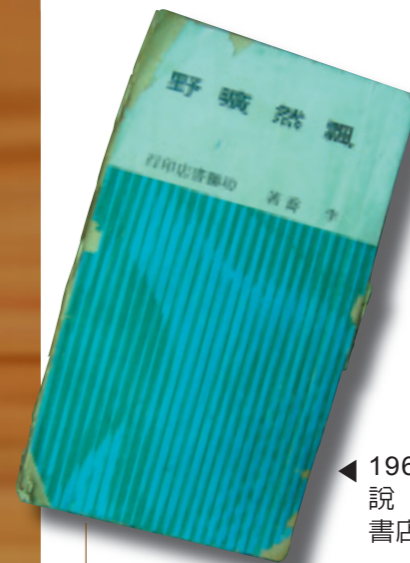
理性與感性兼具的  
李喬



文·攝影 / 水筆仔  
圖片提供 / 李喬

兩年前獲頒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10屆「國家文學獎」的小說家李喬，透過文學創作為拋甩不掉的宿命荊棘尋求救贖之道，半世紀超過700萬字的著作，不僅滌淨自己的心靈，也為台灣文壇留下匯集歷史與文學的傳世鉅作。

◀ 上蒼給李喬一個悲苦的童年，卻也不忘給他一枝五彩筆，讓他透過文學創作為生命尋求救贖之道。



◀ 1965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《飄然曠野》（幼獅書店）。

## 悲苦童年 淬煉心志

李喬，本名李能棋，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鄉境的番仔林，童年和少年時代都生活在與原住民泰雅族居地接壤的偏僻山村，「隘勇」出身的父親日治時期積極參與農民運動，因此不是坐牢便是逃亡，家裡的經濟重擔都落在母親身上。

他在〈母親的畫像〉小說中寫道：「伊活到71歲，約50年的日子都在半飢餓或飢寒交迫中度過，所以嘴邊佈滿『餓紋』是很自然的。」幼子弱母相依為命，

讓他從小便見證貧病相鄰的景況。

「我們住的房子牆壁是用竹片糊上泥巴，年久失修便出現很多破洞，冬天點上番仔油燈（沒有過濾的煤油），風一吹，油燈便搖搖擺擺，母親抱著膽小的妹妹，妹妹有時看到影子就會害怕地大叫：『有鬼哦！』我發現母親也在發抖。」

「番仔林」，原本是原住民的土地，李喬聲稱家族已被原住民「番化」，因為早年原住民仍保有「出草」習俗，但是「出草」時都會先通知他們不要出門。

童年時，李喬常隨泰雅族老酋長「禾興」去打獵，老酋長經常跟他講「性」和「死亡」，而這兩件事對他影響頗深，「性和死亡是漢文化裡的兩個禁忌，而我童年時天天談這個，讓我的思考比較廣闊。」另外，孤獨、深山、密林裡的成長經驗，激發他的夢想與想像力，對他後來的寫作產生絕對性影響。

然而在他受盡欺侮、輕視與貧困的年少歲月中，母愛使他不至於學壞，「母親無私的愛，為我辛酸、凜冽的生命路程，

鋪上一層溫柔母愛，讓我的心靈底層沒有受傷。」報考師範學校時，母親拿出一把半數以上生了銅銹、不知道藏了多少年月的銅錢給他當報名費。

竹師三年，受歷史老師吳顧言影響，18歲就接觸佛學和哲學，專攻近體詩的周紹賢老師，也讓他對中國古詩詞非常入迷。20歲在《野風》雜誌發表處女作新詩〈墳墓〉，寫作靈感來自竹師後面有一條客雅溪，溪對面的客雅山上是墳地，夕陽一照，墳地的墓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## 結義西來庵 與歷史接軌

1957年寫下第一篇小說〈酒徒的自述〉，兩年後發表於「教育輔導月刊」，1963年以〈苦水坑〉獲「自由談」雜誌徵文首獎，激發他的寫作熱情，兩年後，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《飄然曠野》。



▲ 《結義西來庵——噍吧哖事件》1977年出版後，李喬開始向歷史事件擷取小說素材（台南縣文化局）。



▲ 1943年李喬（左一）與家人攝於蕃仔林舊居門前。前排右起：母親、妹妹、父親。後排立者為哥哥。（李喬提供）

1967年，以〈那棵鹿仔樹〉獲頒第三屆「台灣文學獎」，這對當時剛取得高中國文老師資格的李喬而言，無疑是開啓他往後長達8年短篇小說「全盛時期」的金鑰匙，同年就發表了20篇中短篇小說，創下台灣文壇難得的紀錄。

以《山女—蕃仔林故事集》為軸心的創作，是李喬短篇創作最初的原型，蕃仔林世界裡，因外在世界桎梏而陷入物質貧困窘境的人們，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、免於餓死，掙扎的窘困和悲苦，幾乎

完全否定生命繼續存在的意義，如果不是身處其間，或許會被認為這樣的人間世界生不如死，例如〈阿呵，好嘛！〉的阿火仙，日治時代好歹也曾是「漢書先生」，因為大東亞戰爭徵兵「和尚」都死絕了，只好抓「風水、地理先生」充數，淪落為蕃仔林的人守屍作法事。

1976年，42歲的他猛然發現，徒有形式追逐不到文學，才深有所感地主張該回到文學的主題，當年，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指示撰寫中國先賢先烈傳，並從台

灣人物開始寫，受邀撰稿的李喬決定以余清芳等人領導的噍吧哖抗日事件為題，不僅熟讀省文獻會裡300多萬字的文獻資料，還帶著成大中文系學生到南化、台南西來庵、玉井、阿里關、甲仙等地做了半個月田野調查。1977年出版《結義西來庵——噍吧哖事件》。

童年時，父親也曾跟他談到余清芳事件，其中有件事他在書中沒有提及；噍吧哖事件結束後，留下幾百個婦人，日本政府就用背小孩子的背帶綁住這些婦女的手拉到屋外，讓那些日軍自外地召來的「羅漢腳」抽「虎鬚」（類似抽籤），抽到年輕的很高興，抽到老婦人的當場就哭了起來，因為不帶回家還不行，那名老婦人就安慰他：「沒關係啦，我有些錢可以給你補貼家用，你就把我當作老媽媽照顧好了。」

李喬強調，寫《結義西來庵》讓他學會田野調查的技巧，「那個時候訪問不能當面做筆記，看了、聽了以後就先強記下來。」讓他深感佩服的是，日本人無論好事壞事都真實記錄，包括每一個死刑犯的口供，「看了實錄裡記載的時間、地點，加上田野調查，歷史事件的時間、空間、事件架構，便會在腦海裡構成一個物理空間。」

例如他曾看過一個簡單的記錄：「8月某日，那天下午風雨很大，三百多虜情不穩，使用槍械。」他去南化時，鄉公所的人告訴他，當地蓋警察局時，從地底挖出好幾百個骨骸，他將史料和田調互相應證；史料上說「使用槍械」，就是把那些人殺了，證據就是挖出來的那些骨骸。「對我來說，讀了史料再田野調查之後，整個歷史的架構有了立體感，提起筆來根本不必費腦筋就一路寫下去了。」

選擇寫余清芳，對他一生發生決定性的影響。他開始向歷史事件擷取小說素材，並決定以開拓台灣以及歷史事件為經，他們一家三代生活風貌為緯，1977年起稿他的文學代表作《寒夜三部曲》，由《寒夜》、《荒村》、《孤燈》三部作品組成。

《寒夜》以一個客家家族的墾荒經驗為軸心，描述冒險到鄰近原住民部落開墾的危險和艱辛；土地是人的根本依靠，土地往往也是人類痛苦紛爭的淵源。《荒村》以台灣抗日運動從武爭進入文鬥的非武力抗日階段為背景，描寫以農民組合為主體的農民運動。《孤燈》寫入被戰爭打亂打散的台灣社會；青年冤死異域，土地、人民都遭受搜刮掠奪，昔日的弱女子「燈妹」也帶領一家人通過重重劫難，成



▲《恍惚的世界》出版於1974年，描繪現代都會人在種種現實壓力下扭曲、恍惚，生命充滿痛苦（三信出版社）。

為蕃仔林居民精神上溫暖的熱源。

### 書寫228真相 向父親致意

由於《寒夜三部曲》只寫到戰爭時期的台灣，終戰後的台灣社會背景，尤其是228事件，在戒嚴時代一向被視為創作取材的禁忌，1994年出版的《埋冤1947埋冤》，除承擔書寫歷史事件的文學責任外，另一層意義則與父親有關。

父親在日治時代一直在抗日，讓他們的境遇相當悲慘，終戰後，代表政府接收大湖區，黨政軍權一手在握神氣了半年。

1947年發生「228事件」時，那幾天父親都躲在房子裡喝酒，3月8日傍晚，父親的兩名保鏢跑來跟他報告：「大湖街上要打人了！」父親聽後醉醺醺地就衝到現場，阻擋民衆打人，村民因為尊重父親，結果大湖區包括卓蘭、大湖、獅潭、泰安四個鄉都沒有發生打人事件。

兩三個月後，李喬親眼目睹父親半夜被帶走，罪名是「領導暴動」，經過一個多月，父親在桃園被人活埋了一半，是劉定國（蔣介石時代當參謀，後來當過苗栗縣縣長）把他拉起來的，父親回來後性格大變，什麼壞事都做，讓全家覺得很丟臉，所以李喬對父親一直懷有怨恨。

父親過世後，楊逵送他一本《警察沿革誌》，裡面有父親的名字，他才慢慢理解，像父親這樣的台灣人，一心擁抱祖國，一輩子顛沛流離置兒女於不顧，終戰後，竟然因為阻擋群衆打「阿山仔」（外省人）差點喪命，李喬抱持回報父親的心情，書寫「228事件」的真相。

### 埋頭耕耘 文壇肯定

李喬讀竹師時，受吳願言影響開始接觸佛學，這位學識淵博卻不修邊幅的老師，經常一手拿兩支冰棒、一手從長袍的

口袋裡掏出花生米，在大街上邊走邊吃。坐在一旁的李夫人就糗他：「他倒還不至於不修邊幅，但是常常在街上拿著杯珍珠奶茶，邊喝邊吐奶茶裡的冰塊。」

生活看似隨性，但李喬坦承個性有兩個極端；有時非常感情用事，有時則非常理智殘酷。「走路時看到螞蟻，我一定盡量躲開不踩到牠，可是對那些十惡不赦的人，真想替天行道予以毀滅。」

他以前住的地方有條河，有人非法電魚，他就警告說要報警，電魚者對他說：「你去報好了。」後來他真的報警，一看到警察電魚者就逃走，警察一離開他又回來。「我說，這個人如果掉到河裡被電了，我一定不救他，我太太說不行，兩個人就為此吵架。」他便把這件事寫成小說〈罪人〉。

文學創作超過半世紀的李喬，在教育崗位上，曾獲教育部全國特優教師，文學創作也獲獎無數：台灣文藝獎、吳三連文學獎、巫永福評論獎、台美基金會人才成就獎、鹽分地帶台灣新文學特殊貢獻獎、文學台灣基金會小說成就獎、國藝會國家文學獎。

李喬住在苗栗縣公館，居所隔著一灣淺溪就是整片的稻田，遠處是鬱鬱青翠

的山巒，稻田一角的大樹下，有座土地公廟，客家人稱「伯公廟」。回首超過半世紀的文學創作，李喬表示：「也許是深山出來的孩子，我養成一種低著頭努力不看別人往前走的習慣，而且發現只要你肯下工夫，就可以克服很多事情。」

儘管生命歷程與文學創作一路坎坷難行，但他善用上蒼賜予的五彩筆，一字一句，書寫台灣這塊土地的悲歡與離合、歷史與真相，謙沖為懷的修養、包容學習的生命態度，小說家李喬為台灣文壇立下與國際接軌的里程碑。[源](#)



▲李喬1999年接受齊邦媛教授建議，將《寒夜三部曲》寫成精華版《大地之母》（遠景出版社）。